

文明比较视野中的新冠肺炎疫情

任悦溪 苏新宇

长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长春 130032

【摘要】2019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这是一场不见硝烟，不闻炮响的战争，对整个世界、人类社会影响深远。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应对此次突发事件，追根溯源是文明的差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展现了世俗主义、集体主义、人民至上以及和谐观念等特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展现了宗教主义、个人主义，利益至上以及竞争观念等特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这样的“黑天鹅”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所以在后疫情时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中国与外国应以此为契机，引而深知，进一步完善各国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对不同文明群体来说都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中国

美国东方文明的“世俗主义”与西方文明的“宗教主义”“世俗主义”又称作“现世主义”或无神论，而东方文明中尤其是中华文明被证明是“世俗主义”的典型代表，对于这一倾向，自中国古代就有，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强调人们应该关注现世生活，活在当下，道家的“道法自然”，以“自然为本”取代了“神本”的绝对地位，用“自然之天”取代“意志之天”，法家批判天神观念，破卜噬迷信，倡导无神的生死观、鬼神观和祸福观，肯定了人的自我能动性。因此古往今来，中华文明就反对崇拜鬼神和知命乐天，主张把人的注意力放在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集中于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强调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强调活着就有希望，人命关天，是中国人民的信条，这一信条使中华民族或成为世界上最注重生命的一个民族，中国人民在这次抗疫大战中，为了活着，为了与病毒抗争，宁可接受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严重损失，也毅然然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按下了“暂停键”，这“壮士断腕”的壮举，震惊了世界。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置于首位，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人命关天的道德理念，可以看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者群体对生命的高度敬畏，对积极求价值理念的践行。

而西方文明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影响，在古希腊时期，死亡是哲学家最常谈论的议题之一，认为死去只是肉体的消亡而非个体意志的消失，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死亡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他们相信后世生活、生死轮回，更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面对死亡时自然比东方显的从容淡定得多，疫情期间出现了“当我们进入四月，在温暖的天气里——病毒就会奇迹般消失”的言论，将国人的生命交之于上帝的青睐，只有这样，才会对纷乱的世界产生安全感和永恒感，虽然西方国家具备一定的科学精神，但是很难改变人们对自身拥有的能力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在极度无助时对上帝有所期待，愿意相信神才是主导一切的，有人将疫情的爆发看作是上帝对其信徒的训诫、惩罚，潜台词就是要人们

选择接受，西方人民可以因为人为引起的种族歧视而爆发规模的示威游行，却对政府在新冠疫情中的不作为能够容忍，就足以说明西方人对天灾、上帝所降临的惩罚的冗余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西方国家在疫情惨重的情况下，出现了反对接种疫苗的潮流，这其中原因与他们的信仰密切相关，首先源于意识植入，在很久之前，信仰宗教或相信预言的人就被植入了一种意识，认为打疫苗是人类被控制的标志，一旦打了疫苗，人就成为兽人，而非人类了，其次接种疫苗关乎信任问题，是对科学、对公权的信任，而西方更愿意相信神的指令，将宗教信仰凌驾于理性科学之上；最后接种疫苗涉及身体的“主权性”问题，他们认为人是来自创世主的杰作，是最贵重的杰作，完美而健康，一旦注射疫苗就是对杰作的破坏，对神的违背，对权力的侵害。东西方群体在不同文明观念的影响下，对死亡的畏惧程度形成了具有显著差异的生死观，中国人对死亡表现出敬畏之情，而西方人则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西方人不畏惧死亡，只是他们对死亡的警惕性远低于我们，只有当死亡人数超过人们所能接受的范围，疫情达到不可控的程度，触及到人的利益时，西方人才会搁置对神的依赖，转而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东方文明的“集体主义”与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中国的历史传统强调集体意识，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要求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集体的利益，以社会集体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重集体轻个人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源于中华文明所处的东亚，极易垦殖，季风性气候显著，雨热同期，水热充足，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

对于人类文明的形成具有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原始农业文明发达，而农耕模式影响了人群分布，所以农业生产必然伴随着人口高度集中，土地资源的限制导致人民必须压缩自己的欲望和权力，转而构建协作的生存关系，使生存结构趋向集体化，这种集体化、集体主义在中

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实践中得到发展,在乱世中,如果不发挥集体主义的作用是活不下去的,对于个体来说,他对共同体有一种天然的依赖,个人无法脱离“共同体的脐带”[1],一个人只有把他和集体事业相融合时才最具有力量,也就是说团结协作才有可能与病毒相抗衡。西方文明则强调“个人主义”,重视个人权力、个人价值,它在西方思想文化中由来已久,是西方现代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的内核,对于它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这个时期史称“英雄时代”,或称“荷马时代”,代表作《荷马史诗》,这是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一方面史诗中的主人公们表现出为民族、为集体奋斗牺牲的高尚精神,另一方面用神奇的笔调描写英雄形象,显示出一种追求成就,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突出地颂扬了个人的力量、智慧,表现出很强的个体本位和个人英雄主义,在后续思潮发展中,使得个人主义日益意识形态化。在这次危机中,中央集权制——集体主义与分权制衡——个人主义,在碰撞中崩裂出火花。中国作为集体信仰的国度,民众自发的以牺牲自身隐私权限和自我自由限制的高度自觉意识,以及中央决策的垂直统一贯彻与步调一致,使得中国社会的动员展现了惊人的整齐划一姿态,使整个国家的防疫节奏避免了割裂、间断乃至冲突的发生。同时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以及各种救援力量站在同一利益立场,对于最先爆发疫情的武汉,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和高效配置的集体救援,从而如堵住洪水一般,防止了疫情的全面迸发。反观美国,这是一个要求持续流动和满足个体自由的国家,公民隐私和个体自由的政治正确,成为政府无法果断实施强制政策的意识形态的阻碍。当疫情肆虐横行之时,个人主义,强调了个体自由、财富自由、言论自由,高调宣称“不自由,毋宁死”,“只要自由顾,生命皆可抛”的言论,这种自由超脱了现实世界,将个人自由凌驾于疫情管控,成为虚幻的自由,一些人不但不遵守“封城令”,而且还冲上街头示威反抗政府的决策,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甚至将戴口罩视为弱者的象征,至2020年7月,美国确诊人数居高不下,特朗普总统却心心念念早日复工,将个体的死亡,不再看成是政府的原罪,而是单纯的个体不幸。西方这种自上而下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和选择,意味着他们采取的是典型的美国模式,而非中国模式。东方文明的“人民至上”与西方文明的“利益至上”“人民至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是对传统民本思想做出的马克思主义新阐释,“人民至上”作为价值命题,不仅是人民立场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更是人民安全至上。在疫情来临之时,国家和政府迅速做出判断,对最先爆发疫情的武汉,下达了封城令,一声令下,全民皆兵,14亿中国人几乎都呆在家中,戴上口罩,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两座方舱医院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力求从新生婴儿到百岁老人都得到救治,坚决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在全国范

围内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2]这是中国在抗疫时贯彻“人民至上”原则的最好说明,这是“人命关天”的信仰。

反观西方,一些国家将虚伪的“人权”与“自由”置于人的生命之上,认为选票政治远胜于选民的生命健康,对选举的关注远远超过对疫情的关注,资本利益至上的本性暴露无遗,将经济价值凌驾于健康价值之上,宣称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将染病的人看作是个体的脆弱和不幸,显示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在被问之为什么新冠病毒感染者中死去的多是穷人、老人以及弱势群体时,时任美国领导人曾回答:“这就是生活”,不谈生命权的国家何以谈人权?疫情这面棱镜,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西方政治体系维护的是资本利益,“自由、平等、公正”早已被金钱异化。疫情爆发于武汉之初,中国按下了经济暂停键,为各国抗疫提供了“黄金窗口期”,而西方应对疫情时,被资本利益牵着鼻子走,优先考虑的是资本利益而非公众福祉,为保股市,忽视疫情预警、淡化疫情风险,更关注经济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公共卫生安全,在尚未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重启经济,陷入“恶化——缓解——恶化”的怪圈,而在其中受益最多的则是富人群体,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鸿沟。东方文明的“和谐观念”与西方文明的“竞争观念”中华文化“以和谐为最高价值追求,重视责任、义务、群体,而西方文化以竞争为最高价值追求,重视自由、权利、个人”[3]。西方国家不是不追求和谐,而是要通过竞争获得利益的基础上,从而达到自己所认同的和谐。在危机来临时,中国讲求的是和谐,是“以和为贵”,不仅是立足于国内的个人服从集体的和谐,更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互帮互助,彰显了中国海纳百川、胸怀天下的精神品质,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4]。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中国通过官方渠道,迅速、公开、透明,毫无保留的向世界发布疫情的最新情况和相应的防治办法,当国内疫情呈现稳定下降态势之后,我国向世界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毫无保留的伸出了援手,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2019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5]两个平台,保障科学数据和信息共享工作的开展,通过这两个平台向世界各国分享适合不同阶段患者的治疗方案,组织多场视频连线,与各国进行深入交流,分享中国诊疗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亲历亲为,开展元首外交,特别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强调:“要想赢得这场人类重大疫情的战争,国际社会必须增强信念、齐心协力、团结合作、凝心聚力、共同应对”[6],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信心。迄今,中国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了各种类型的援助,从物质援助到技术支持再到人员支持,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和”为本的价值理念,展现了大国担当。在疫情大流行下,西方国家的情况就与此不同了。斗

争与摩擦似乎超越了“和谐”的状态，国家内部表现为民众对政府命令的不服从，不同政治力量的相互掣肘，在疫情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这也是西方国家难以像中国一样做到全政府，全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外部，即世界范围内，表现为直接冲突和间接冲突。所谓直接冲突，是指西方国家在防疫问题上对华的攻击，首先表现为美国率先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对中国污名化，将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散布“中国实验室制造病毒”、“中国赔偿论”之类的阴谋论，带有严重的政治偏见和荒谬预测，这是对自己国家疫情防控不力掩耳盗铃式的行为，寻找“替罪羊”，煽动其他国家共同敌对中国；其次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以此为手段来攻击中国，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转移公众舆论焦点，缓和民众对政府危机管理的不满，甚至将封城和接种疫苗等措施看作是出于政治动机，给世界卫生组织和部分科学家施压，胁迫他们放弃客观公正的立场，将病毒源头指向中国，一味地谋求地缘政治利益，最后将疫情武器化，将疫情问题转化为攻击他国的政治武器，对外推责甩锅，颠倒黑白，将一场本应全球协作共同抵御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变成大国角力。而间接冲突，则是西方国家借助疫情强化对其他领域的冲突，特别是经济、科技领域。在经济领域方面，美国加快对华经济的“脱钩”进程，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全球供应产业链的剥离，蛊惑各国全球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因此美国政府宣称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拉拢其他国家一道寻找中国全球供应链的替代者，除此之外还在产业、投资、金融等方面力图推动对华进一步“脱钩”，表现为将各国本土企业撤离中国，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限制资本对中国的投资。在科技领域方面，发动对华的“技术冷战”，以“国家安全”为由，将矛头对准研发先进商业技术的中国私营企业，并对疫情期间中国使用高科技手段，大规模获取私人数据，对特定人群进行定位跟踪等方法，赋予“高科技权威主义”的标签，宣称国家侵犯人权，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离间国民之心。并且在技术方面进一步对华施压，对华为公司进行打压，要求使用美国设备制造芯片等产品的外国企业在向华为出口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5]。美国试突借助疫情对华进行技术封锁从而压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的野心原形毕露。结语从总体来看，在此次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不同文明群体在防疫的策略上有所不同，瑕瑜互见，这源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绝不能以偏概全的肯定一个国家或者否定一个国家，东方文明所代表的世俗主义、集体主义、人民之上和谐观念，使得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此次抗疫中凝成一股绳，聚成一股力，向世界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西方国家，由于推崇宗教主义、个人主义、利益至上和竞争观念，在这样的文明背景下，相关的国家政策没办法像中国等东方国家一样，高速度、高效率的全体动员，使所有人进入“战时状态”，实现全政府、全社会，

而且西方政府的三权分立，三个权利主体独立行使权力，形成各主体之间的“制衡”，使得政府的职能行使、资源调度等权力有限制，并且公民在价值观的影响下，有自己的选择，个人对政府的依赖较少，他们也不允许拿自己的自由去交换健康权，这不难看出西方的政治体制比较难以应对疫情这种突发危机。

截至 2022 年 5 月 18 日，Worldometers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超过 629 万，而美国死亡人数已超百万，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且变幻莫测，而中美关系是未来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特殊的双边关系，病毒没有国界，疾病不分种族，面对百年来全球发生的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途径多样为特征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封闭思维寸步难行，共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的各国，应停止争吵，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摒弃前嫌，拒绝零和博弈，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双赢，持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像疫情这种突发事件绝不是仅有一次，面对重大危机、面对全球问题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普世价值。此次疫情给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疫情过后，为防止悲剧重现，各国应深度思考，总结抗疫经验，完善各国治理体系，牢记“唯有和谐与合作才是人类共同繁荣进步的最佳选择[6]。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 113 页
- [2]2020 年 5 月 22 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 [3]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1.
- [4]中国政府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 [5]中国的抗疫数字来了.[EB/OL]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613/15/4295303_918253277.shtml.[2021-01-10]
- [6]邓志慧、宋子节.提振信心，共克时艰 G20 特别峰会传递哪些信号[EB/OL].人民网，2020-03-27[5]“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Amendments to General Prohibition Three (Foreign-Produced Direct Product Rule) and the Entity List,” Federal Register, May 19,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5/19/2020-10856/export-administration-regulations-amendments-to-general-prohibition-three-foreign-produced-direct>.
- [7]习近平.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N].新华社，2020-03-26